

体育外交战略探析

马冠楠 刘桂海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探讨体育外交战略的概念、现实功用以及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的历史脉络有助于彰显其在和平发展背景下特有的作用。体育外交战略具有契合时代背景、开辟外交战略新路径、实现国家利益的功用。从“台湾问题”上的外交博弈、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外交策略、中美乒乓外交的战略影响、北京奥运会的外交意义四个方面对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的历史发展展开讨论。

关键词: 体育管理; 体育外交战略; 回眸

1 体育外交战略的概念推演

文献检索显示,国内还没有研究正式提出过“体育外交战略”这一概念。体育外交战略既是体育外交在战略学领域的发展,也是外交战略在体育学中的体现,应当涵盖体育外交与外交战略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国家间文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谋求人类社会的沟通与共荣,为跨文化沟通与协商搭建平台,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由此可见,体育外交战略从属于大战略理念。其次,国家的总体战略包括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两个方面,外交战略属于后者。传统的外交理念强调通过正式官方机构与人员,采用访问、谈判、会晤以及签订条约等形式与他国交往。随着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概念的不断 development,现有的外交理念越来越注重文化交流与沟通在国家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体育既折射出国内文化的特征,又在世界范围内显示其文化共性,体育外交战略的概念也应该突出文化交往这一属性。再次,体育外交是国家为了推行对外政策、实现外交目的,采用

竞赛比赛、体育文化交流、国际体育决策参与等体育手段对外交往的一系列活动,体育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体育外交战略包括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目的以及行为方式几个要素。

在廓清了战略、外交战略以及体育外交的概念之后,我们认为:体育外交战略是指国家在总体国际战略思维指导下,制定并实施的在体育领域内推行国家外交政策、进行国际交往、实现国家利益的一整套策略规划。

2 体育外交战略的现实功用

2.1 契合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

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0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都指出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发展已经被确立为中国21世纪国家发展的战略原则与目标,这已成为指导我国内政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根本纲领。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TY008)

第1作者简介: 马冠楠(1986-),男,江苏徐州人,硕士。主要从事体育哲学、竞技运动、体育外交战略研究。Tel:(021)54341502, E-mail: hsgl1027@163.com。

体育外交战略对于中国的崛起有内外两方面的作用。首先,体育本质上是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它象征着自由、公正、友谊,并且为世界人民所共享。其次,体育外交战略可以为我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体育外交战略通过传扬体育文化,能够有效推进各国家价值观的融合乃至重铸。体育外交战略的目标之一是传播和平、团结、博爱、协作、公正的价值观,从多极与共赢、自由与民主、竞争与合作等,为世界发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参考,并在推进人类共和、共生与共荣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2 开辟外交战略的新路径

战略理论的演变与外交实践对体育外交战略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的提出是战略内涵扩大的标志;软权力概念的兴起象征着战略要素的增多;体育外交战略的推行标志着国家对外交往手段的扩展。一般认为,政府外交的主体是官方,民间外交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公共外交则二者兼有。其实,这三者都是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它们的宗旨都是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政策,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利益。

体育外交实践与这三种外交形式都有动态互动的关系。官方外交方面,我国政府曾在上世纪50年代针对台湾加入奥委会问题进行了艰苦争斗,甚至不惜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在公共外交方面,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后仍引人注目,在我国最新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开篇就是《Thrilling Chinese Athletics》,邓亚萍、姚明、丁俊晖、郎平、刘翔、郭晶晶等知名运动员先后出境,以阳光、奋进、友好的体育人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在民间外交方面,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其他各类民间体育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搭建起各种形式的对外交往平台。体育外交战略的实施应注意与这三种外交形式的创造性结合,扩大我国对外交往的手段。

2.3 实现国家利益的新方法

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等方面,它是一切国家行为的标靶。国家利益

的实现需要政治行为、文化行为以及经济行为在外交领域的合力。体育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产生的社会现象,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首先,体育外交成为政治利益博弈的重要战场。中国政府为了妥善解决台湾奥委会会籍问题而创造的“奥委会模式”就是采取体育外交途径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例证。从这里也反映出,体育外交战略是遵从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其次,文化传播与交流既是体育外交战略的途径,也是目的。文化影响力作为“软权力”的核心要素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安全也成为实现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的关注点。我国体育外交战略既要着眼于宣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要肩负捍卫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任。体育外交活动对包含体育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进行集中展示,实现国家文化利益是体育外交战略追求的目标之一。最后,经济利益一直是我国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我国体育产业的市场效应得到了巨大的发挥。中国体育用品拥有全球65%以上的体育用品生产份额,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生产制造基地。实践证明,“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市场模式是卓有成效的。体育外交可以通过竞技比赛、文化交流、体育商品推介等手段为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宏观的导向与助力,并由此推动经济的繁荣,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此外,自我国入世之后,贸易竞争与摩擦较以往明显增加。体育外交可以通过官方磋商、谋求商业仲裁、危机公关等手段,解决体育贸易争端,捍卫体育商业权益,实现国家利益。

3 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历史回眸

3.1 “台湾问题”上的外交博弈

在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国家对外交往中既重要又敏感的话题,这一关乎主权与国家尊严的问题必然折射到体育领域中。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通过左右国际体育组织,染指台湾问题。新中国在体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由于国际奥委会拒绝撤销台湾体育组织作为“国家奥委会”的申请,中国政府在多次

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于1958年选择脱离国际奥委会。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先生与当时的主席 Brundage 就台湾奥委会问题进行过言辞激烈的信件往来。新中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这一断就是21年。1960年的国际奥委会罗马会议决定，在《奥林匹克宪章》增加了一项阐明“country（国家）”和“nation（民族）”这两个词语的脚注：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毫无关系，宪章中的“country（国家）”和“nation（民族）”这些词语是用来指称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地区或者领土。这份声明使国际奥委会在19年后在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基础上，使中国接受台湾在国际奥委会的会员身份。在1979年的名古屋会议上，国际奥委会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同时决定台湾奥委会可以作为一个地方体育组织，以“中国台北奥委会”（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名义加入国际奥委会，至此，台湾问题在国际奥委会引出的外交争斗得到解决。中国时隔21年后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也为中国与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恢复联系提供了契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台湾奥委会会籍问题得到解决，但大陆与台湾在奥运领域内进行的政治性争斗却仍未结束。

3.2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外交策略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放弃了之前“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转而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新战略，努力团结广大亚非拉等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1958年退出国际奥委会之后，在反苏反美的时代大背景下，我国体育外交的重心转向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这一阶段，我国为了在体育领域内拓展生存空间，积极与广大亚非拉独立国家开展体育交往。其中的关键事件就是参加1963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办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当时，大陆与印尼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尼方面承诺大陆将不会与台湾在1962年的亚运会上展开竞争。我国外交部为此特别发出外交复照，以答谢印尼政府的邀请。由于印尼在台湾参赛问题上的立场与国际奥委会意见不符，后者撤销了其对此届亚洲运动会的赞助，并威胁要进行制裁，随后开除

了印尼的奥委会会籍。这激怒了印度尼西亚的总统 Sukarno，他以带头组建新兴国家运动会的方式来予以回应。新兴力量运动会结束后，田径总会、亚洲足、国际举重总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也相继对印尼方面进行了制裁。新兴力量运动会与之后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办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体现亚洲在美苏两极推行霸权主义的压迫下，利用体育谋求政治的话语权的努力，通过与当时代表西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奥运会的分庭抗礼，新兴力量运动会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外交霸权主义的顽强抵抗，体现了对平等、自由、民主精神的推崇和向往。尽管西方国家与受其操纵的国际体育组织对新兴力量运动会进行打压与制裁，但因其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表态与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的巨大冲击，这届属于亚洲人民的运动会已经载入史册。

3.3 中美乒乓外交的战略影响

在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对抗的爆发，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上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并时刻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取得在美苏博弈中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陷入困境。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宣告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办。中美两国乒乓球手在乘车时的偶遇不仅使本已被中央否定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成为可能，并带来连锁反应。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也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1972年，尼克松访华，而后中国乒乓球队访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外交终于修成正果。乒乓外交的产生是一种历史偶然，但又具有非常现实的时代背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为了扭转冷战中由于越战导致的战略弱势，希望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并以此牵制苏联。而中国出于同样的目的，决定采取“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乒乓外交作为一种温和的外交试探，为中美两国缓和关系创造了机会。美国抛弃冷战以来的对华敌对政策，对中国重新进行战略评估并恢复对华邦交，这为中国走出当时的外交困境创造了至关重要的国际环境，间接促

成了此后中日建交以及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苏三方的外交博弈同样影响到后来的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的乒乓外交在重塑了国际政治版图,促使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战略作用。

3.4 北京奥运会的外交意义

北京奥运会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它的现实意义也远超出体育的范畴。奥运会为外交活动搭建平台,同时外交活动赋予奥运会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依靠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外交实践的重要内容。

北京奥运会肩负着展示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重任。北京奥运会的外交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正式的高层会晤,一类是半官方与非官方的民间外交。在官方外交方面,来自全世界 80 多个国家的 110 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王室代表、地区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及配偶出席了胡锦涛主席在 2008 年 8 月 8 日中午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欢迎宴会,奥运会期间,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均到访北京。在民间外交方面,奥运会为世界各国民众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提供一个体育的窗口。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锐意进取、蓬勃发展的东方大国,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与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中国的普通民众与民间团体在体育文化交流、国际友人接待、志愿者服务、观看比赛等方面起到了树立国家形象的作用。

4 结语

当前,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在国家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在 2009 年,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努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体育强国的建设既依附于大国崛起,又可以为大国崛起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66.
- [2] 瞿少华.试论 21 世纪初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5):25.
- [3] 钱其琛.世界外交大辞典[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999.
- [4] Susan Brownell, 'sport and politics don't mix'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OC during the cold war. In Sports and Cold War, edited by Stephen Wagg and David L. Andrews, 263. London: Routledge.
- [5] 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J].国际政治研究,2008,3:79.
- [6] David F. Gerrard, Playing foreign policy games: States, drugs and other Olympian vices. In Sport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edited by Steven J. Jackson and Stephen Haigh, 111. London: Routledge.